

## 从佐餐小食到利用厚生:近代花生的引种及其商品化探析

陈 明

(西北大学 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花生的商品化生产是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美种大花生的引种与规模推广,花生逐渐发展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作物,效益显著。从商品化的主要指标来看,花生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程度与其商品量、商品率、流通范围均呈正向关系。近代花生商品化生产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与当时口岸贸易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交通条件的改善、生活方式的转型、农民生存的需求等因素交叉互动,构成了花生由普通生产错综演进为商品生产的连续场景。

**【关键词】**花生;冀鲁豫;农业商品化;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4-0070-11

## From Snack to Wealth: The Introduc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Peanut in Modern China

CHEN Mi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History of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Abstract:** The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peanut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modern China. With the import and scale promotion of American peanut, it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economic crops produced for the market, with great economic benefits. Judging from the main indicators of commercialization, the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peanut production has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its commodity volume, commodity rate, and circulation rang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peanut in modern times echo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rt trade,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raffic condi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style and the demand of survival. Its constitute scene of peanut produced from ordinary into commodity production.

**Key words:** peanut;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 province; agricultural commercializatio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一项重要变化,便是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根据珀金斯(D.H.Perkins)的研究,17世纪以后,中国人口的持续增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sup>①</sup>。这种以人口增长为牵引的发展模式,被学界称之为“广泛性的成长”<sup>②</sup>。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以降,农业的成长发展确实与农产品的商品化关联密切。据马若孟(R.H.Myers)所言,1890—1937年,华北农村人口持续增加,耕地高

**【收稿日期】**2020-09-06

**【基金项目】**西北大学科研启动基金“古代食用油传播嬗变与技术实践研究”(363042005002);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美洲经济作物在中国的流动及其历史刻度研究”(21JK0371)

**【作者简介】**陈明(1990—),男,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讲师,科技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① [美]珀金斯,伍丹戈校:《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宋海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66页。

② 王业键:《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其危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年第7期。

度零碎化,但农民生活水平并未随之下降,佃农比例亦未显著增加,原因之一在于经济作物的栽培带给农民较高的收益<sup>①</sup>。黄宗智进一步指出近代华北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程度,20世纪上半叶河北及山东西北部经历的商品化程度,至少相当于过去三个世纪的总和<sup>②</sup>。所谓农业的商品化,可以从粮食作物的商品化和经济作物的商品化两个方面来观察,粮食作物的商品化主要透过农民“集精粃粗”的方式进行。至于纯粹为市场而生产的经济作物,较粮食作物更能显示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的一般倾向。关于“经济作物与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课题,以往研究倾向于从整体上论述,而对具体某种经济作物的发展过程及其造成的农民收入的升降、作物结构的调整、生产性质的转化、运销结构的变动和社会经济的变迁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由于资料与篇幅的限制,本文亦无法全面论述近代中国各项经济作物的发展演变,仅拟选取花生作为讨论的主要对象。近代花生的栽培面积、产量均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发展又与政治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因此,笔者以花生为例,或可在相当程度内涵盖近代中国经济作物发展的复杂面貌。

关于近代花生生产的发展与影响,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主要集中于运销体系、商业流通、产销状况等面向<sup>③</sup>。但作为近代发展起来的重要经济作物,鲜有学者系统梳理花生由普通生产演进为商品生产的历史过程。故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通过相关分析以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花生是如何在传统小农市场经济逻辑下开启商品化的历程;(2)近代花生商品量、商品率、商品流通范围等主要指标的发展程度如何;(3)近代花生商品化生产得以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 一、生产扩大与经济效益

花生在明末由南美传入中国,传播路线大致由沿海推广到内陆,由南方传布到北方<sup>④</sup>。17世纪以后,花生逐渐成为农家日常栽培的农作物。花生引种之初,栽培面积与产量虽然有限,但对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和农家生产经营已发生相当显著的影响。如康乾时期东南沿海的府县,花生因其“脆壳轻松味可夸,堆盘宜酒更宜茶”<sup>⑤</sup>,成为百姓“寻常杯杓”必资的佐餐小食。另外,花生制品(带壳花生、花生仁、花生油、花生饼)已被记载作为商品出售:揭阳县“揭中市集皆是”<sup>⑥</sup>;潮州府“饶平人多业此为生”<sup>⑦</sup>;台湾府“童将炒熟者用纸包裹,鬻于街头”<sup>⑧</sup>,“榨油之利尤饶,巨桶分盛,连橇压舂贩运者,此境是资”<sup>⑨</sup>。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花生油、花生饼更是台湾出口至大陆的主要货物之一<sup>⑩</sup>,谢金銮《台湾竹枝词》有诗云:

① [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5—240页。

②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124页。

③ 相关研究参见陈为忠:《近代华北花生的运销体系(1908—1937)》,《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郭声波、张明:《历史上中国花生种植的区域特点与商业流通》,《中国农史》2011年第1期;丁德超:《试论清末民国时期河南花生的产销状况》,《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王宝卿、王思明:《花生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国农史》2005年第1期;王保宁:《花生与番薯:民国年间山东低山丘陵区的耕作制度》,《中国农史》2012年第3期。

④ 王宝卿、王思明:《花生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国农史》2005年第1期。

⑤ [清]谢元淮:《养默山房诗稿》卷5《鹭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2页。

⑥ 乾隆《揭阳县正续志》卷7《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2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949页。

⑦ 乾隆《潮州府志》卷39《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2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451页。

⑧ [清]黄叔瓚:《台海使槎录(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0页。

⑨ [清]朱景英:《海东札记》,岳麓书社,2011年,第32页。

⑩ 林哲安:《日治时期台湾花生栽培与花生油产销》,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35页。

“并黠粕贩卖内地,舟航不绝载。内地近山人,买其黠以粪田。”<sup>①</sup>长期在云贵地区为官的檀萃也注意到闽粤植花生之利,呼吁乡人种植,“今已遍于海滨诸省,利至大。若南北遍种落花生,其利益中原尤厚”<sup>②</sup>。

不过,在19世纪末期以前,花生生产受制于品种、交通与市场的因素,始终没有重大的发展。逮至光绪后期,上述情况急遽改观。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美种大花生的输入与传播,这也正是近代花生业得以急剧扩张的一大契机。1862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C.R.Mills)将弗吉尼亚型花生引种到山东半岛,因其有产量高、个头大、便收拔以及食用、制油两相宜等品种优势,故种者日多,土种寥落<sup>③</sup>。随着新种代替旧种趋势的扩大,大花生种植业逐渐在各主要花生产区覆盖。据阮湘的《中国年鉴》所论,“落花生生产额之增殖,实在19世纪之末叶……由美输入大粒之落花生种,移植于山东一带,品种甚优,产量亦丰,于是北部各省落花生之栽培,日见推广,其需要亦因之大有加增焉”<sup>④</sup>。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推行的农业政策是花生栽培扩展的重要原因。同治《东乡县志》载有一则当地政府的“劝种花生示”:<sup>⑤</sup>“本邑种花生者则罕矣,以未知花生之利与用花生之法也。两粤种花生者,每家或百石,或数十石,俱以榨油。猪膏之外,此为上品……务使物产各尽其用,而沙地亦无废弃,则获利无穷,岂仅曰小补之哉。”<sup>⑥</sup>20世纪初,山东省对于花生推广,尤属不遗余力,“示劝黄河沿岸农民,加意栽培花生,发以种子。盖欲利用黄河沿岸荒地,广栽花生,以增产额,裨益商业也”<sup>⑦</sup>。兹将民初以来各省历年花生田面积及产额的变化,表列如下(见表1),以供参考。

表1 各省历年花生面积及产额比较表(1914—1947)

年份 省份	1914—1918年	1924—1929年		1931—1937年		1938—1947年	
	面积 (千市亩)	面积 (千市亩)	产量 (千市斤)	面积 (千市亩)	产量 (千市斤)	面积 (千市亩)	产量 (千市斤)
山东	2367	3758	14970	4395	12 557	2869	6943
河北	1658	2550	7554	3571	8516	2717	7282
河南	675	2119	5192	2384	5383	736	1535
以上三省合计	4700	8427	27716	10350	26456	6322	15760
占17省总计(%)	33.8	50.1	54.5	46	49.2	35.5	38.7
江苏	1670	2061	7465	2167	6352	1035	2287
安徽	807	748	2324	1132	2295	627	1442
江西	273	933	2852	730	1671	1448	3536
广东	500	566	1585	1747	3276	2186	4189
四川	2805	1009	2211	2416	5525	2188	5171
以上八省合计	10755	13744	44153	18542	45 575	13784	6943
占17省总计(%)	77.4	81.7	86.8	82.4	84.7	77.5	72.82
十七省总计	13902	16809	50845	22512	53804	17785	1535

资料来源: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5—196页。

① [清]谢金銮:《台湾竹枝词三十一首之十七》,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卷8《艺文3》,《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第32册》,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613页。

② [清]檀萃,宋文熙、李东平校:《滇海虞衡志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3—254页。

③ 王传堂:《美国大花生传入山东的考证》,《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

④ 阮湘:《中国年鉴(第1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124页。

⑤ 同治《东乡县志》卷8《风土志·土产》,《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793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第326—329页。

⑥ 《山东物产志》,《商务官报》1910年第30期。

由上表观之,20世纪前期花生生产得到长足发展,其中无论面积或产量,山东皆居首位,河北、河南次之,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以冀鲁豫三省为主要的专门化生产区域。另外除1938—1947年长期战乱造成的农业生产衰退外,各省自1914年之后花生的种植面积与产量总体呈持续增长之趋势。足可反映近代花生栽培与推广的兴旺。

美种大花生的规模栽培,对于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经济收益,增加农民积累以及推进农业商品化进程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若干地区,美种大花生的推广栽培,甚至成为农民主要的生产活动,农民利用厚生,多取资于斯。

在山东,青州“二十年来民间种者甚广,工省而易收,亦贫民所利也”<sup>①</sup>。安邱“自青岛通商以来,舟车便利,落花生仁始为出洋大宗,运往他境,岁约数百万斤,其利亦云大矣”<sup>②</sup>。泰安“自清光绪十许年后,播种五谷不能丰获,以艺花生,收入顿增,近年为出口大宗,民间经济力遂因之而涨,此新兴之利,古无有也”<sup>③</sup>。临朐“易收而利厚,销运出口,为农民收入大宗”<sup>④</sup>。宁津“种植之利,推花生果,既可以轧油,穗亦可以饲畜。向届秋成,粤商之来宁收买花生者,有总行五家,分行十余家,综计岁入颇巨”<sup>⑤</sup>。青岛“今岁收获甚丰,出口已将及一万四千余吨,价值约在一千五百万元左右。而台儿庄运往江南、德州运往津沽及零星运销各处者,尚不在此数,其利益之厚概可想见”<sup>⑥</sup>。烟台“种植花生区域,日益增广,估计面积约占农田三分之一,良以种植花生所获收益,较之杂粮为优也”<sup>⑦</sup>。

在河北,滦州“得种落花生之法,昔无食而今果腹矣,昔无衣而今裤襦矣。从前出产每年只得银二万两,近五六年来已增至五六十万两”<sup>⑧</sup>。丰润“落花生油,客商多运以舟车,邑人获利较厚”<sup>⑨</sup>。唐山“自咸丰年间有相地之宜,倡种落花生者,较种五谷得利加倍,十数年来,无论城乡,凡有沙土地者,均以种植落花生为上策”<sup>⑩</sup>。深州“光绪十许年后,花生之利始兴。以此种者沾其赢余,相习益多。亦颇自榨为油,以便民用,其岁入过于种谷。此近年新获之田利,前古无有”<sup>⑪</sup>。新乐“在昔居民贫苦不堪度日,后得种花生法,而土性适宜,种无不收,又得灌溉之法,歉年几不多见。全县内一百零八村,大半皆种花生,常有百亩,竟种花生八十亩者,以种五谷不如花生利厚,每亩平均约得大钱十二千”<sup>⑫</sup>。

在河南,中牟、开封、兰封“自前光绪二十年间洋花生之种子输入,实粒肥硕,收获较丰。民间多乐种之,每亩平均收成,可得百余斤,获利较五谷为尤厚”<sup>⑬</sup>。新乡“内外商人收买转运,遂为东南乡出品之大宗”<sup>⑭</sup>。

上述资料表明,我们无法明确回答近代各地由花生生产所达到的效益水平,但是由花生种植所呈现的成长趋势来看,其对农村经济与农民生计关系重大。如民国初年河南花生种植已相当普及,甚至对该

① 咸丰《青州府志》卷32《风土考·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2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② 民国《续安邱新志》卷9《方产考》,《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68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81页。

③ 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1《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77页。

④ 民国《临朐续志》卷10《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63页。

⑤ 光绪《宁津县志》卷2《舆地下·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⑥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68页。

⑦ 《1922—1931十年海关报告》,《五十年各埠海关报告:1882—1931(第十一分册)》,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⑧ 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中·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20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148页。

⑨ 光绪《丰润县志》卷9《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2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25页。

⑩ 光绪《唐山县志》卷1《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⑪ 同治《深州风土记》卷21《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5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89页。

⑫ 《第一次实业调查记(直隶实业调查)》,直隶省商品陈列所,1917年,第22页。

⑬ 《花生米贸易之发达》,《新闻报》1919年10月30日。

⑭ 民国《新乡县续志》卷2《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南府县志辑·第1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361页。

省的财政发展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据1919年《申报》报道：“中牟、开封、兰封所产花生每年约获一千一百万元之收入，其利益自可惊矣，三数年前，商人之营运此业者赢余甚厚，每致骤富，官府以此项交易既巨，获利既丰，随亦设局征收捐，每年收入亦不下四万余元。”<sup>①</sup>可以说，花生新品种的输入与推广为近代中国部分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推力。

## 二、商品化发展的主要指标

学者汪敬虞指出，如果要考察近代农业商品化水平，那么农产品的商品量、商品率、流通范围均是重要指标<sup>②</sup>。如何理解近代花生商品化生产的发展水平，必然绕不开观察这些要素。如前所揭，花生是光绪末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作物，随着市场需求扩大与价格提高，花生的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发展，商品量和商品率达到了相当高度。呈现的特点是，在花生产业集中地区，农民视之为主要作物，栽培集约，产量丰富，商品化的比率也相对较高。

以花生重要产区冀鲁豫三省为例，20世纪二十年代，河南陇海沿线的中牟、开封、兰封花生年产量约12万担，销往省外9.3万担，省内消费2.7万担，外销率达77.5%<sup>③</sup>。据1925年在河南陈留、通许、睢县等地花生消费情况的调查，当地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26%~50%，商品率已高达75%~97%<sup>④</sup>。再依植物油公司调查，1936年河南花生的商品量、商品率稳定发展，如中牟县年产花生米三十五万担，外销二十五万担；开封年产六十五万担，外销四十万担；兰封一百万担，外销九十万担，全省共计年产花生米约三百二十九万担，外销二百四十万担，每担按十元计，可收入两千余万元<sup>⑤</sup>。

河北花生的商品量、商品率也大幅提高。据1905年的调查，晋州“每年约出五六十万斤，外销三十余万斤”，束鹿“岁出花生约一二百万斤”，滦州年产花生“百万有奇，销运广东及东三省”<sup>⑥</sup>。另据河北省实业厅调查，1929年河北花生全年本地销售率占71.7%，外销率为28.3%。花生油则相反，本地销售率仅占22.1%，外销率达77.9%<sup>⑦</sup>（见表2）。从翰香曾指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华北农村居民普遍食用价格低廉的豆油，而从邻地买进花生榨制价格较昂贵的花生油，大多仍用于出口销售”<sup>⑧</sup>。

表2 1929年河北省各县花生销量表

产地	产量(斤)	出境数量(斤)	外销率(%)	销场
大兴	3216000	3200000	99.5	北平,天津
宛平	7250000	7000000	96.6	张家口,天津
安次	1500000	1000000	66.7	天津
涿县	14000000	2000000	14.3	北平,天津
新城	3380000	1780000	52.7	北平,天津
涿县	1000000	900000	90	东三省
卢龙	8000000	6000000	75	东三省
抚宁	4000000	3000000	75	东三省

①《纪河南之落花生》，《申报》1919年10月30日。

②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第666页。

③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第673页。

④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32页。

⑤《调查豫省油料》，《大公报（天津版）》1937年4月1日。

⑥《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95页。

⑦《河北省工商统计》，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1929年，第195页。

⑧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2—153页。

续表2

临榆	20000000	19000000	95	东三省
昌黎	27800000	27000000	97.1	天津,东三省
迁安	5000000	3500000	70	天津
遵化	40000000	30000000	75	天津
丰润	15000000	10000000	66.7	天津
玉田	2700000	2400000	88.9	天津
三河	8000000	2000000	25	北平,天津
密云	2000000	1100000	55	北平,天津
蠡县	15128000	5128000	33.9	保定
定县	1300000	500000	38.5	保定
无极	1500000	1300000	86.7	天津
宁津	4100000	4000000	97.6	天津
深县	3000000	2000000	66.7	天津
广宗	1000000	300000	30	附近各县
南宫	1600000	800000	50	天津
新河	1200000	600000	50	天津
濮阳	15000000	10000000	66.7	济南
东明	40000000	30000000	75	洛口
长垣	25000000	1401000	56	洛口
威县	17300000	13300000	76.9	山东临清
清河	15600000	13500000	86.5	济南,天津

资料来源:《河北省工商统计》,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1929年,第170-172页。

注:本表花生产量仅选录超过百万市斤的县市。外销数包括销往外县、外省、外国的数量,表3同。

前述山东花生产量居全国之首,其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运销于省内、省外以至国外的数量自然亦极可观,商品率为各省最高。据山东省国际贸易局调查,20世纪30年代,鲁省花生常年产量为10823065市担,除少数民间销用,并供给本省榨油厂外,输往他省或出国者有5967829市担,计占产量55.1%(见表3)<sup>①</sup>。如合算邻地销售与出口数量,花生商品率达到90%~95%<sup>②</sup>。

表3 20世纪三十年代山东省各县花生销量表

产地	常年产量(市担)	常年出境数量(市担)	外销率(%)	销场
威海	180000	180000	100	上海,广东,国外
齐河	138340	64500	46.6	济南,青岛
齐东	162099	60000	37	济南,周村,青岛
泰安	317300	250000	78.8	青岛,天津,上海
莱芜	200000	180000	90	博山,泰安
惠民	138240	80000	57.9	济南,周村,滕县
乐陵	288000	26000	9	天津,济南
曲阜	268800	235040	87.4	青岛,济南
宁阳	152000	120000	78.9	青岛,济南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山东省国际贸易局,1934年,第五编,第197页。

②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152页。

续表3

邹县	220000	120000	54.5	青岛,上海
滕县	400000	250000	62.5	青岛,上海
临沂	145094	100000	68.9	青岛,上海
郯城	360000	260000	72.2	青岛,上海
蒙阴	350000	200000	57.1	博山,大汶口,东口
莒县	403803	164160	40.6	大汶口,青岛
沂水	317421	121415	38.2	青岛,坊子
菏泽	151565	114024	75.2	济南
曹县	176558	69392	39.3	河南商丘
单县	216000	180000	83.3	徐州
冠县	300000	225000	75	济南,天津
恩县	500000	230000	45	济南,天津
德县	125000	100000	80	济南
平原	170000	119000	70	济南,天津
陵县	200000	24000	12	济南,天津
临邑	125000	100000	80	济南,天津,青岛
朝城	300000	150000	50	济南
棲霞	159000	159000	100	烟台
莱阳	348750	250000	71.6	青岛
文登	144000	80000	55.6	威海
荣成	132000	80000	60.6	威海,烟台
胶县	200000	150000	75	王哥庄,王台,兰村,青岛
高密	140875	90000	63.9	青岛,上海,国外
即墨	224125	120000	53.5	青岛
广饶	300000	200000	66.7	青岛
临朐	162000	10000	6.2	青岛
诸城	350000	87500	25	高密,青岛
日照	392000	315000	80.4	青岛

资料来源: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山东省国际贸易局,1934年,第五编,第197-203页。

注:本表仅选录产量超过十万市担的县市。

我们从上文所述虽无法精确估算冀鲁豫三省花生商品化生产的速率,但仍可肯定其在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作物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商品化比率有日趋增多的倾向。由此亦可证实,近代中国的花生生产已经脱离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附属性质,从而转化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的一环。

由于生产专门化、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原来只供农家家庭自身消费或在邻近地域销售的花生,开始进入长途贸易网络,流向国内市场,乃至远销国外。19世纪末期以前,各海关花生出口数量已有相当规模。据薛福成日记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二十三日:“镇江出口土货以花生、豆子为大宗,上海花生油出口畅旺。”<sup>①</sup>另从光绪《时务通考》所载,可知当时多个海关口岸有花生出口贸易的记录:

镇江,本年出口土货之价值多至一百四万八千余两,其中花生油、芝麻油三十万余两。花生五十万二千余两,较之昔年均属有增无减。九龙,由港往澳货物中之增多者,有花生油等。

<sup>①</sup> [清]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第769-771页。

拱北,花生油多,值银十三万七千余两。琼州,花生饼等出口略多。北海,花生饼五万三千余担,溯自光绪十二年以来,以本年为最盛,此货昔由本埠商人,载华船出口居多,本年始有潮商来贩,附载轮船,以图快捷。龙州,因花生歉收,出口少油三百担<sup>①</sup>。

花生成为大宗出口土货之后,其从产地市场到出口市场的运输距离拉长,流通范围明显扩大。如在冀南某村,1920年花生销售范围在本村及附近各村三数里内,至1935年,已由大名、道口等地转运天津输出海外<sup>②</sup>。另从表2、表3来看,山东、河北各县花生主要运销到青岛、济南、烟台、威海、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铁路要站或通商口岸。上述城市交通便利,商务殷盛,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花生转运市场和出口市场,其中尤以青岛最为重要。据姚方仁调查,1924—1933年,由青岛出口的带壳花生数量除1927年及1933年退居第二外,其余八年均居全国首位;花生仁与花生油出口数量则恒居首位,且占全国出口额的绝对多数<sup>③</sup>。青岛花生的来源尤可说明流通范围的扩大,来源主要有三路,其一,由铁路运来,以济南沿津浦线、黄河、运河一带为中心,其主要产地分为三大区域:(1)莱芜、新泰、蒙阴、泰安、大汶口、泗水、滕县等处所产;(2)黄河以西所产,一部分由小清河运至烟台,一部分由济南运至青岛;(3)沿胶济线,如博山、坊子、安邱、昌邑、青岛、平度等处所产,俱由各分车站运至青岛。其二,由民船运来,亦分为三途:(1)青岛以南,如沂州、吕州、日照等处所产花生,先集于涛口、青口、安东街等地,然后再运到青岛,而江苏省北部所产,亦有取道海州集中于青岛;(2)青岛以北,如莱阳、平度、即墨、海阳等县所产花生,先集于金家口以运往青岛;(3)胶州湾一带所产花生,直接集于青岛市场。其三,由轮船运来,仅沿海产花生各地,为数极少<sup>④</sup>。实际上,青岛花生来源并不只限于山东,尚有河南开封、江苏徐州、河北南部等地花生通过铁路、海运萃集于此<sup>⑤</sup>。由此可以得知,内地农村生产的花生已经可以透过通商口岸及海洋交通与世界经济相联结。这一转变,反映的是近代农业商品化进程的新特点,也是与传统农业商品生产发展模式相区别的重要指标。

### 三、商品化发展的原因与条件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界对近代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生产的动因已有探讨,学者李金铮将之归纳为五种类型:“特别强调国外市场的作用;国外市场的拉动,国内市场需求以及农民的贫困化都是农产品商品化的诱因;强调农民贫困化对农产品商品化的推动;主要是贫困化所致,但也有谋利的推动;来自农民的利润追求。”<sup>⑥</sup>上述观点为我们分析近代花生商品化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供了参照系。近代花生商品化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是由当时的内部动因与外部诱因等多种因素互相角力的结果。

第一,从社会经济需求的视角看,近代口岸市场与新式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花生商品化生产。“一战”以后,通商口岸农产品出口市场的增长以及国内机器榨油业的兴起与发展,花生成为亟需的工业原料。19世纪末,花生出口数量至微,市场需求并不畅旺。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花生用途进一步扩大,被视为重要的食品、化学、油脂以及工业原料,导致国内外市场对其需求甚殷。1890年花生出口量尚不过六千担左右,翌年虽增加为七万五千担,于对外贸易无足轻重<sup>⑦</sup>。1908年,德国商人开始在青岛设行收买

① [清]杞庐主人:《时务通考》卷17《商务8》,上海点石斋1897年刻本。

② 纪彬:《农村破产声中冀南一个繁荣的村庄》,《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第505页。

③ 姚方仁:《我国花生仁及生油之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12期。

④ 《中国花生与花生油之调查》,《工商半月刊》1932年第8期。

⑤ 参见《开封之花生市场》,《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12月30日;《花生(续)》,《国际贸易导报》1936年第26期。

⑥ 李金铮:《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⑦ 姚方仁:《我国花生仁及生油之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12期。

花生输入海外,嗣因西方国家对于此物极为欢迎,输出大增。花生自此发展成为大宗出口土货,在对外贸易中从无地位可言到所占比重居出口土货前列。据调查,1931年,花生制品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3.07%,居出口土货第十位,1932年,出口值占总比3.94%强,居第六位<sup>①</sup>。又据学者综合统计,1908—1937年,花生及其制品出口量持续和稳健成长。“一战”以前,合计出口在150万担左右,“一战”时落至100万担,1919年突破250万担,其后略有消退,1923年之后有数年冲破300万担,1929年以后输出畅旺,1931年出口达到峰值,接近500万担。其后再次消退,但仍然维持在200万担以上的水平<sup>②</sup>。这就说明,1908年以来,花生出口贸易持续成长,使得20世纪前三十年的贸易规模与19世纪末十余万关担水平有明显差别。通商口岸是农户生产的农产品进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桥梁与纽带。1840年后,沿海、沿边、内地被动或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达110个<sup>③</sup>。前文已述,秦皇岛、天津、烟台、威海、青岛等均是花生输出商埠。实际上尚不及此,上海、大连、汉口也是重要花生出口市场,哈尔滨、安东、牛庄、龙口、九江、镇江、徐州、宁波、温州、厦门、汕头、广州、九龙、江门、三水、梧州、琼州、北海、龙州、腾越、宜昌、南京、芜湖、福州、长沙、南宁等口岸亦有相当数量的花生制品出口<sup>④</sup>。与此同时,沿海商埠的新式机器榨油产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光绪以前,榨制花生油一直沿用旧式土法,效率较低,造成花生油只限于农村使用,运输不广,市亦不繁。至1919年,民族资本开办有天津北洋制油厂,镇江、开封等地相亦继开办,机器榨油业兴旺一时<sup>⑤</sup>。又据1934年实业部调查,天津、上海华商创办的花生油厂资本在十万元以内,其中上海油厂每年产量有一到两万担,天津油厂每日可出产七百斤至两千斤不等。青岛油厂主要由外国资本经营,其中由日本人经营的油厂,资本大多超过数十万元,生产额亦大,年产少者有十万斤,多者计有五百万斤<sup>⑥</sup>。如此规模的产油量,可见消耗原料数量极大。这就表明,出口和加工两架“马车”拉动了花生的商品化生产。

第二,花生商品化生产的经济诱因来自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交通条件的改善则为其商品化保持稳定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20世纪以前,由于受交通限制,农户所产花生大都仅流通于农村附近的集镇市场,输出至为有限。20世纪初,全国竣工通车了多条铁路线,如胶济铁路(1904年)、平汉(京汉)铁路(1905年)、北宁(京奉)铁路(1907年)、京沪(沪宁)铁路(1908年)、陇海铁路汴洛段(1909年)、津浦铁路(1912年)<sup>⑦</sup>。另外,埠际之间的运输大都用轮船代替了帆船,载运能力增强。随着铁路与水运等运输条件的改善,内陆腹地农村的花生出口到通商口岸的运输距离和时间缩短,出口量大幅增长。如津海关1895年以前输出花生数量极少,而铁路开通以后,周边地区的花生云集天津,致使码头货栈里堆积如山<sup>⑧</sup>。又如河南花生,“民国之期,因仅有内地销场之故,生产数量,颇称微少。乃至陇海铁路通车后,外庄交易,渐次发达,因而产量随之俱增,而淤没之农村,亦获稍苏,嗣后逐年进步,出口数量,与年俱增”<sup>⑨</sup>。而且由于铁路载运量大,速度快捷,其运输费用较诸其他交通工具相对低廉。据一项1926年的调查,华北平原货物的运输费用以铁路最为低廉,仅有水运勉强能与之竞争<sup>⑩</sup>。在铁路与水运运输低廉而相对敏捷的有利条件推动下,冀鲁豫三省农民可以大量将所产花生从产地运销至市场进行交换。

① 《花生》,《国际贸易情报》1936年第1卷第24期。

② 陈明:《花生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研究(1631—1949)》,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9年,第155页。

③ 吴松弟:《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机制与表现》,《史学月刊》2009年第8期。

④ 具体花生输出埠别及数额,参见余沛华:《中国花生产销概况及其输出贸易》,《国际贸易导报》1931年第10期。

⑤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第1432页。

⑥ 《中国经济年鉴(下)》,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17页。

⑦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五十年各埠海关报告:1882—1931(第十分册)》,第225页。

⑧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第524页。

⑨ 《豫东花生业发达》,《中行月刊》1934年第6期。

⑩ 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7年,第16页。

第三,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花生产业的扩大,而生活方式的近代转型同样是花生商品化发展的重要驱动机制。花生引种之初,因种植有限被当作罕见的精制食物来看待。迨至近代,随着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兴起以及饮食习惯与消费形态的变革,人们对食用花生已产生普遍认同,花生成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廉价休闲食品,“食此者,无阶级之可言,茶余酒际,莫不以此相响”<sup>①</sup>。一方面,城市中不论在人口稠密的公共空间(如百货商场、戏园、电影院、茶馆、车站、餐馆等)、普通商店或是街头的贩夫走卒都有售卖,供人消遣。零售市场的稳定需求带动了花生经营商行的发展。如汉口有花生炒货店一百余家,大炒户每日可炒熟花生五担,小炒坊一二担,当日皆可售完,每年销场在万担以上<sup>②</sup>。另一方面,农村中食用花生俨然成为日常生活习俗的一部分。齐如山对华北农村日常生活中花生的消费环节有细致的观察:“花生蘸,为糖果中之妙品,价亦不贵,全国点心铺中无不售此者,年节消项尤大;咸酥花生,点心铺中无不售此,乡间小贩亦皆带卖,北平则有专门售此之小贩,足见他消项之大;炒花生,到了冬天,乡间各处都有售者,人人都要吃一些;花生糖,糖果铺都带售此,乡间卖糖之小贩亦无不售此,可以说是小儿的专食品,然待客亦多备此,年节更是少不了的物品。”<sup>③</sup>这些情况表明,在新的经济背景下,花生实际上已发展成为日常性消耗品,背后的商业逻辑则是协同农作物商品化完成结构上的变动,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第四,近代农村经济的状况要求农民为维持生计寻求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花生在价格和销售方面的优势无疑是驱动农民选择种植的基础。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困境是人口持续增长与耕地不足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沈松桥综合历次调查统计,分析认为近代河南农村由于长期的人口增长,造成耕地严重不足、人地比例相去悬殊,更使得耕地日趋细碎,小农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骨干<sup>④</sup>。又据费孝通调查的江村显示,拥有不到10亩地的人口占90%之多,劳力剩余<sup>⑤</sup>。在当时土地分配不均,人口过密的情况下,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无法维持基本生计,劳力集约程度较高、经济收益较大的经济作物自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一条宣泄管道,成为小农争相种植推广的对象。此外,随着天津、青岛、上海等口岸贸易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网络的改善,国外洋货经由各种渠道大量涌入内地农村市场,造成各地农民家庭手工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直接后果是绝大部分农民经济活动的受限和家庭收入的拮据。而农家生活资料又不得不依赖市场,从而加大了农民对现金的需要。据卜凯(J. L. Buck)在安徽、河北、河南等七省十七处农场调查,1921—1925年,农民生产与收入中所需现金与非现金的比例几乎对半,田场收入部分现金比例还要高于非现金收入。田场支出部分各处平均现金支出47.6%,非现金支出52.4%,田场收入各处平均现金收入58.1%,非现金收入41.9%<sup>⑥</sup>。另据马札亚尔(L. Madjar)在广东省来晋村调查,农家消费支出23.4%从自身自然物中付出,76.7%是由货币付出<sup>⑦</sup>。上述说明,当时农村货币经济的比重已经上升,而农民又无其他扩展收入来源的路径。面对现实生存上的压力,扩大花生等商品经济作物的种植不外乎是最直接的应对方法。陈伯庄在河南新乡调查时曾指出:

在外谋生,有钱寄家,宜多种粮食,以备灾荒,遇善价亦可售出,而有商品作物之功用。若回乡做活,别无现款收入,非种商品作物,则必需之食盐,避体之土布,亦无钱易得。故棉花,黄豆,芝麻,花生四者,为华北农民利用厚生之源。如一察农村之生计,与此四种商品作物产销所

① 赵朴初:《长生果的功用》,《上海医报》1930年第56期。

② 《汉口之落花生》,《银行杂志》1925年第6期。

③ 齐如山:《华北的农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70—174页。

④ 沈松桥:《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1906—1937)》,《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330—339页。

⑤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5—137页。

⑥ [美]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鸾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4页,第96—97页。

⑦ [匈]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陈代青、彭桂秋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第474页。

关之重大<sup>①</sup>。

另外,农民之所以规模种植花生,重要原因是其在市场价格与销售上的良好表现。据调查,1915—1923年,全国花生仁价格由每担4元涨至8元以上,花生油价格从每担8元涨至18元余<sup>②</sup>。1929年,河北花生每百斤平均利润有6.52元,花生油每百斤的收益则是5.75元<sup>③</sup>。另外,从青岛、天津、秦皇岛的市场交易价格来看,亦能显示花生市场的荣景。1924—1928年,青岛带壳花生由每担7.3元涨至12.5元,花生仁从每担8元上升至14.5元,花生油由每担16.75元跳到27.7元<sup>④</sup>。1928—1929上半年,天津、秦皇岛花生由6.6元涨至10元<sup>⑤</sup>。由是观之,由市场价格与销售反映出的收益状况,必定会影响到农民的种植选择。正是由于这种经济效益刺激农民种植,花生生产才有可能从小规模试种扩展成为专业化、商业性的集约经营。

## 结 语

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来探讨近代花生的引种生产及其商品化。随着美种大花生的引种,花生在近代蜕变成成为市场而生产的经济作物而得到大规模的栽培与推广,蔚为农民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花生的商品化生产构成了近代中国农产品商品化体系中基础的一环,反映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出现方向性的转折。回顾全文,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美种大花生的引种与传播,是近代花生业得以发展的主要契机;第二,从商品化的主要指标来看,花生生产专业化和区域化程度与其商品量、商品率成正比。花生市场流通范围的大小则与其商品化、专业化程度亦呈正向关系;第三,近代花生商品化生产始终处于当时国内、国际情势的影响之中,口岸贸易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交通运输的改善、生活方式的转型和农民生存的需求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近代花生商品化生产,而花生商品化生产同样映射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

总而言之,花生的例子显示,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帮助农民积累资本,增加收益。因此,花生的商品化从侧面显示出近代农业经济另一种可能的发展途径,同时也为研究近代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好题材。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 [参 考 文 献]

- [1] 王思明. 外来作物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生活[J]. 中国农史, 2018, (2).
- [2] 郭声波. 历史上中国花生种植的区域特点与商业流通[J]. 中国农史, 2011, (1).
- [3] [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4] 陈为忠. 近代华北花生的运销体系(1908—1937)[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3, (1).

① 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交通大学研究所,1936年,第17页。

② 彰望恕:《花生产销调查记》,《农商公报》1924年第8期。

③ 《河北省工商统计》,第201页。

④ 《胶澳志(三)》,胶澳商埠局,1928年,第92页。

⑤ 《去年花生出口贸易状况》,《工学月刊》1930年第2期。